



考古新发现 让中华文明更丰满

本报记者 邹雅婷

3月29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经过项目汇报、专家评审和投票，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从20个人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华文明新论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介绍，2018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具有年代跨度大、分布范围广、内涵丰富等特点。时间上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直到近代甲午战争时期；地域范围从西北的新疆到东南的广东；发掘对象既有墓葬，又有古人的居址、城址，城址和墓葬中还包含手工业生产的内涵。“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五千年文明史补充了新的材料，提供了新的论证，具有重要的价值。”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不少是国家文物局“十三

五”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的子项目，通过有计划、有重点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探究人类起源、文明起源，梳理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脉络，加深我们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还有的项目与重大政治经济课题相关，如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项目是为配合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展的遗址发掘与文物保护，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被认为是鉴真东渡的出海港口，为东亚文化交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则让我们走近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英魂，唤起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发现都表明，考古工作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多个方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宋新潮说。

促进文物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两个商周时期的项目，均为被盗之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这两处发掘都非常重要，填补了之前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空白。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盗墓所带来的沉痛损失，提醒我们加强文物保护力度，打击盗墓犯罪。”李伯谦对本报记者说。

宋新潮指出，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是有机结合的整体，发掘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入选十大新发现的项目，很多都体现出良好的保护意识。如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位于2022年冬奥会崇礼奥运村的核心区域，在奥运村规划建设过程中，始终把遗址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据悉，该遗址将建成考古公园，为冬奥会增加文化元素。

“很多发现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后续的研究和保护任务还很重。”宋新潮说，“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无疑将对这些地区的文物保护带来很大的促进。”

加强公众参与

“从终评项目的汇报可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开展考古工作的成功案例，运用了三维声呐成像等技术，对同类考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让王巍感到欣喜的是考古成果与公众的联系更加密切。“通过学者的讲解、媒体的宣传报道和公众参与投票，让考古研究的成果为更多人所了解，从而发挥出更

大的社会价值。”

今年的评选活动安排了同步的网络直播，项目汇报的形式也更加生动多彩。陕西澄城刘家洼考古项目展示时，播放了出土钟磬合奏乐曲的视频，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在全媒体传播时代，尝试考古成果与社会共享的新模式。”宋新潮说。

图①：广东英德青塘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

图②：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壶形鼎

图③：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质泥抹子

图④：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出土的炼渣

图⑤：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

图⑥：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的角钟

图⑦：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出土的宋代石栏杆构件

图⑧：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出土的泥质灰陶龙形脊饰

图⑨：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出土的铁雷

图⑩：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出水的“经远”木墩牌

如果你年年都关注“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看着大多数入围的考古项目，可能会有似曾相识的喜悦。

考古的乐趣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之上——人类文明过去所创造的一切都在这个世界留下了遗存，但只有那些没有随着岁月湮灭且能够幸运地被我们发现并破解其密码的，才能够重新复活。穿越广袤的时间河谷，我们能否与历史遗存相识相知，关键在于我们的识别能力。过去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墓葬，现在大家会去寻找与之相关的居址、手工业作坊、聚落中心乃至宫殿、城址以及区域布局，考古项目因此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连续性，探求文明起源及进程的考古自然也有着很好的连续性。一项项考古发现连在一起，慢慢为我们还原历史的轨迹，解开一个个时间空间上的谜团。比如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一座大型台基，一批典型陶器，一批最早的瓦，一座规划严整的院落，就为我们之前关心的陶寺与石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芦山峁遗址位于两个著名遗址之间的关键位置，通过艰苦的发掘、研究，证明这处区域中心聚落与陶寺的早期文化比较接近，而与石峁的关系相对疏远。它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去揣测它是否曾经影响了石峁，但最终和陶寺一样被石峁所取代。

这样填补缺环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入围终评但没有进入十大名单的浙江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它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初鸣遗址在已知的各处良渚文化遗址中，是出土玉料、玉器半成品最多的，为研究当时的制玉工艺和玉矿来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考古发掘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让我们得以更好地探究和认识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良渚文化。

因盗墓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考古项目依然在十大新发现中占了一定比例，但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主动发掘”项目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使是如山西闻喜酒务头、陕西澄城刘家洼这样遭遇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项目，主要也是因其迅速转变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科学探索而被认可。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的考古发掘进行了几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了改变过去这一区域工作的薄弱而专门建立了渭南考古基地，引领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

从1990年首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举办以来，到今年已走过了29年。随着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相继淡出，加上技术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与过去相比有了不少调整。在前期的公众投票、终评现场的直播以及专家团队讨论方面有了许多改进，考古项目的领队、汇报人也呈现出更加年轻化、技术范儿的趋势，多学科的合作在图片和视频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都使我们对这一评选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杨雪梅

破解历史的密码

2018十大考古新发现解读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专家点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标尺；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与多样性、区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聚落形态的角度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内涵。王家湾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发现比较空白的空白，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葬形制改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葬礼仪的认知。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专家点评：芦山峁遗址是继神木石峁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为认识龙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流动、社会变迁、中原与北方区域互动，乃至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

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规整院落，似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落、都邑形制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筒瓦和槽型板瓦的发现，将中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大量玉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其与周边地区普遍流行以玉为礼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价值认同。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专家点评：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为西天山地区人群的业生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发现了丰富的铜、铁冶炼相关的遗迹遗物，是新疆史前唯一一处有明确冶金证据的遗址，对中国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冶金证据的重大发现，将人类对煤炭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为揭示业生方式的转变和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是一处拥有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该墓地应为晚商高等级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地应为“匡”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匡”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铜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加上该墓地所处的特殊位

置，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专家点评：从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所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特点来看，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这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同使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栏木漆棺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家港博物馆

专家点评：考古工作者历经十多年，揭示了唐宋河道，发现了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和栈桥遗迹，提出了黄泗浦河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曾为繁华的港口，在江南地区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新认识。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寺院，发掘者认为可能与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地点有关，是较为重要的新认识。这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及海岸线变迁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

专家点评：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遗址是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这是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级重要

城址。根据考古新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推定此遗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其双重城垣遗址理念，主体建筑呈中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等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选址与营建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编号“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是金代官式建筑研究的重要资料。“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等组合的确认，极大地推进了金代官廷用瓷制度的研究。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专家点评：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结合历史文献推断，该遗址应为1243年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修筑钓鱼城时所徙的合州州治。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调查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经远舰”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牌，并首次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甲午海战是木质帆船被蒸汽机装甲战舰取代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最早实例之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